



涉及277万多名人大代表

代表法要修改,有哪些看点?

更高效、更便捷、更安全

——从全国两会看数字金融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3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正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这是现行代表法自1992年颁布施行以来的第四次修改。

目前我国有277万多名五级人大代表。代表法是规范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代表职权、履行代表义务、发挥代表作用的基本法律。代表法这次修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

看点一:强化“人民代表”政治要求

人大代表,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代表法修正草案在总则部分首次写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明确各级人大代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己任,做到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

“这些规定将代表履职的政治要求制度化,确保代表始终坚定政治立场、站稳人民立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主任董卫东表示。

“四个机关”,是新时代人大工作和建设的新定位、新要求。代表法修正草案中新增各级人大代表“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建设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机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机关、全面担负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机关”而履职尽责”,凸显新时代人大代表工作的鲜明政治属性。

同时,代表法修正草案对人大代表加强理论及专业知识学习也提出明确要求。“近年来,代表培训从‘全覆盖’转向‘精准化’,提高了基层一线代表的履职能力,有助于我

们提出更多有质量和针对性的议案和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博望镇永合村党总支书记陈小娟说。

看点二:当好国家机关、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

人大代表是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代表法修正草案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两个联系”制度机制,即密切国家机关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让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距离更“近”——代表法修正草案完善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有关规定,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或者乡镇人大主席团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定期组织代表开展联系人民群众的活动,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和闭会期间的活动,都是执行代表职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傅文杰说:“设区的市以上各级人大代表在本行政区域内跨原选举单位视察、开展专题调研等举措,有利于促进人大代表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号准群众脉搏,汲取群众智慧。”

让国家机关与人大代表互动更“密”——代表法修正草案进一步完善人大常委会联系代表制度,完善“一府一委两院”联系代表制度。

目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层面,常委会组成人员直接联系全国人大代表416名,通过与代表座谈、邀请代表列席会议、参加执法检查 and 调研等各项活动,与代表保持经常性联系。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发言人娄勤俭表示:“通过这种形式,基层的声音、群众的呼声可直接反映到常委会,体现到人大立法、监督等工作中。”

“加强‘一府一委两院’同人大代表的密切联系,是接受人大和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促进国家机关更好依法行政、依法监察、公正司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董卫东说。

看点三:让“良言”更好变“良策”

人大代表提出代表建议,从根本上讲是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力。如何让高质量的代表建议最终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暖民心的政策举措?

代表法修正草案明确,代表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本级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或者乡镇人大主席团交有关机关、组织研究办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议案建议办理局局长余洋介绍,自2005年起,代表建议交办就由分别领取建议交办件改为召开会议统一交办,此次修法将较为成熟稳定的工作制度固定下来。

登门拜访、座谈调研、现场答复……形式不同,但目标一致——认真对待每一份凝聚着人民期盼的建议。“此次代表法修正草案,还增加一条有关办理过程中要加强沟通、及时通报情况的规定,目的就是力求办理实效。”余洋说。

办理重点督办建议,是增强代表建议办理实效的一项重要举措,代表法修正草案对代表建议督办机制予以明确。2024年,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结合常委会重点工作及代表反映比较集中、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确定20项225件重点督办建议,推动解决了一批实际问题。

“重点督办建议是推动代表建议办理落实的制度性安排,是发挥代表建议服务大局功效的重要抓

手。此次修法对各级人大做好重点督办建议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将进一步推动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提质增效,更加充分地发挥代表作用。”余洋说。

看点四:为人大代表依法履职保驾护航

目前,我国277万多名五级人大代表中,近95%是县乡人大代表,很多是一线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在担任人大代表的时候,还从事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国家根据需要给予往返的旅费和必要的物质上的便利或者补贴”“可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健全代表履职网络平台”“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年度代表工作计划”……此次代表法修正草案新增了不少便利代表、保障代表履职的新规定。

傅文杰表示,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一项为例,全国人大建设了代表工作信息化平台,坚持以服务代表、方便代表为宗旨,设计平台的结构和功能,以代表为中心,实现各项服务功能、信息向代表端集中,方便代表撰写、提交议案建议等。

“可以”改为“应当”为本级人大代表制发代表证;为身体残疾的代表新增专门规定“应当根据需要给予必要的帮助和照顾”……代表法修正草案中还有不少暖心细节。

代表法与时俱进修改完善,必将保障和促进人大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正如娄勤俭表示,将以此次修改代表法为契机,更好地发挥277万多名各级人大代表的力量,更好地发挥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优势功效。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熊丰 李明辉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新材料:赋能高端制造的“幕后英雄”

近十年来,中国在新材料领域的创新成果显著:从碳纤维到高温超导材料,从钙钛矿到电子皮肤,诸多突破性的发明不仅推动了传统制造业升级,而且还助力未来产业走进现实生活。可谓是高端制造和新兴产业的“幕后英雄”。

3月5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强废弃物循环利用,大力推广再生材料使用”。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聚焦新材料,积极建言献策。他们认为,随着国家的重视,企业加强研发,中国新材料行业已走上“自强”之路。

材料技术革新驱动产业跃迁

“全球共发生四次工业革命,每一次都会涉及核心关键材料的颠覆性改变引发的一系列科技变化。”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所长王立平说。

王立平此言不虚。在新能源革命中,新材料就担当着“关键先生”的作用。

在山东海阳的海岸线上,国家电投10MW钙钛矿光伏电站正悄然改变着人们对该行业的认知。这座电站在发电量上较传统晶硅组件有显著提升,尤其在阴雨天气等环境下,依然能稳定输出功率。

全国人大代表、金晶集团董事长王刚对记者说:“我们正站在光伏产业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起点。”这个看法背后,是对钙钛矿光伏材料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的笃定。

金晶集团作为国内TCO导电膜玻璃领域的领军企业,近二十年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解决了长期制约中国钙钛矿光伏行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

“纵观新能源电池的发展历史,性能的每一次革命性突破,材料都是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全国人大代表、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天任告诉记者。

2025年以来,人形机器人炙手可热。这个未来产业如何实现产业化?新材料是绕不开的一环。

今年2月,上市公司福莱新材在上海展出了由新材料制成的柔性传感器新产品。这是一块用于机器

人身上的电子皮肤,半透明薄膜,一寸见方。透过阳光,薄膜内一缕缕银色的丝线纵横交织,反射出点点金属光泽。

“电子皮肤可以柔软地贴在机器人身上,同时又能承受剧烈的撞击。”福莱新材首席科学家陈书厅告诉记者,有了它,机器人便拥有了触觉,能够感知压力、温度,甚至是物体的接近。

“新材料的发展将带动一个行业的跨越式发展,帮助我国在国际竞争中把握优势。”全国人大代表、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庆表示,近年来低维材料,特别是二维材料发展势头迅猛,若得到长足发展,有望成为未来信息领域的关键材料。

王立平认为,新材料的产业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上下游产业链发展的带动作用上。很多材料的产业链很长,这些材料的迭代更新对相关产业的拉动效应明显。

镁材料是推动制造业低碳化、轻量化的核心战略资源,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3C电子壳体等场景已先行应用。

“必须依靠科技创新,以颠覆性技术重塑行业规则。”全国人大代表、今飞凯达董事长葛炳柱举例,比如制造汽车轮毂,通过研发新型材料如镁合金等,可以制造出重量更轻、强度更高、安全性能更稳定的产品,实现底层技术突破。

新材料产业化催生万亿级市场

新材料领域的创新突破,撬动着万亿级规模的大市场。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4年1至11月,我国新材料产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0%以上,预计2024年全年将超过8万亿元,连续14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有着“点石成金”魅力的新材料研究往往能够打开新市场。

硅在地壳中含量第二,原料丰富又无毒无害,具备了向下游延展、深入研究的基础。从沙粒玻璃到电子封装材料,二氧化硅在生产生活中应用广泛。

全国人大代表、凌玮科技研发主任黄水波对记者讲述了公司开拓二氧化硅材料市场的难忘回忆。

塑料是早已融入大众日常生活的寻常材料。黄水波告诉记者,若

在塑料中加入不同比例的二氧化硅,就能创造出具有丰富性能的新型塑料。“就如家用的保鲜膜,添加二氧化硅后,保鲜膜、塑料袋更易撕开,且纯度较高的二氧化硅能使塑料薄膜表面保持光滑,提升使用体验。”

“我特别骄傲的一款产品是应用于塑料弹性体的二氧化硅产品。”黄水波表示,尽管产品研发过程艰辛无比,几经迭代才最终问世,但收获也是丰厚的。

“这样的产品有着极高的附加值。”黄水波说,原材料成本只有1000元/吨,但高性能的二氧化硅产品价格可达5万元/吨。

长期关注海洋材料研究的王立平也表示,海洋防腐材料、海洋复合材料均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桥梁、海上油田、采油平台、海上风电等海洋长驻型设备和设施均对海洋防腐材料有着很高的需求。这一材料的市场规模可达千亿元级。”王立平透露,过去这一市场80%的份额均被国外垄断。

新材料行业自强必须面向世界

尽管中国在新材料领域取得了诸多卓越成果,推动了新老制造业的发展与跃迁,但中国新材料行业仍面临基础研究薄弱、产业链协同不足、高端装备依赖进口等短板。

新材料是国家提升经济、科技、国防和民生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金陵石化执行董事张春生建议,通过编制出台行业指导名录、合理划分新材料产业链、简化环评审批流程等有效措施,支持新材料产业快速发展。

张春生表示,目前新材料产业项目环评审批环节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行业界定不够清晰、产业划分不够合理、环评程序不够完善等。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材集团首席科学家兼科技委主任彭寿表示:“当前我国建材生产和建筑应用时有脱节,这是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面对我国庞大的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要加快高强度高耐久、可循环利用、绿色环保等新型建材研发与应用。

有受访代表委员对记者直言,

新材料研究中高校研究与产业需求还存在着“两张皮”现象,甚至材料研究不存在“追热点”式的选题思路,部分科技工作者缺乏长期攻关的定力。

如何突破这些瓶颈?受访代表委员从不同维度提出建议,为中国新材料产业提供发展路径。

张天任认为,材料研发需兼顾“前瞻性”与“应用性”。他介绍,天能集团通过“三级研发体系”实现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高效转化。集团内部的中央研究院聚焦前沿科技,孵化新项目;事业部研究院和分子公司的研发团队则负责推动应用型研发和直接创造效益。天能集团最新的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突破性成果正是这一体系的产物。

“在全球范围内,新能源电池研发的最前沿,就是聚焦在材料领域。谁能在这个领域实现革命性、颠覆性突破,谁就能取得发展先机。”张天任对记者表达了未来继续攻关电池材料的坚定信心。

基于开发弹性体二氧化硅产品的经历,黄水波特别关注以自主创新破解产业卡点、抢占材料产业技术制高点问题。他对方记者提出,新材料突围需聚焦五大方向:自主研发、专利布局、产业链协同、智能化升级和政策与资本支持。

站在学界与业界的交叉点,王立平建议,要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新材料行业比较分散,我国企业若要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市场产生影响力,就一定要培育出大型领军型企业。另一方面,学界应加强与企业的贴近性,两者形成合力,才能攻克国家的战略需求问题和市场痛点问题。

王立平展望,中国新材料行业可能将通过三个阶段走出“自强”之路。第一个阶段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关键卡点技术进行研发,比如航天、航空、核电、海洋、集成电路等领域的难点材料。第二个阶段是实现全链条的技术掌握,即从技术到装备再到应用端的“自强”。第三个阶段,我国将在前瞻性、引领性材料方面取得全球领先地位,真正影响世界新材料的研究和产业布局。

上海证券报记者 王玉晴 霍星羽 罗茂林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数字金融正成为金融体系创新升级的强劲引擎,驱动着金融服务向更高效、更便捷、更安全的方向迈进。

5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完善数据基础制度,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

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和业内人士提出,下一步,金融机构应以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为关键驱动,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重塑数字金融服务模式。同时,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健全金融管理和配套制度机制,提高金融消费者保护能力。

精准“输血”提升服务质效

“现在公司饲料储备充足,奶牛膘肥体壮,每天能产奶十来吨,这真得好好感谢农行的‘牛脸识别’。”山东大丰牛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岩说,银行员工通过手机拍照给牛进行身份认证,一上午就干完了以前打耳标要折腾三五天的活儿,给牛“刷脸”后,公司顺利贷到了款。

杜岩口中的“牛脸识别”,是农业银行推出的数字化产品“智慧畜牧”。通过AI技术精准认定畜类活体抵押物,并进行远程监控管理,不仅解决了广大养殖户担忧打耳标会影响奶牛产奶量的问题,更运用新技术破解了活体资产抵押难题。”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客户经理张卓说。

记者了解到,除活体资产变资金外,近年来数据资产融资蓬勃发展,在精准“输血”科创小微企业的同时,也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全面释放。

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潘越认为,数字金融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与覆盖面,还体现在优化资源配置并加速产业升级、构建多层次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系统化提升风险防控能力等方面。

“凭借在深圳数据交易所上架的数据交易标的,我们成功获得光大银行1000万元无质押数据资产增信贷款,打通了数据从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的转化路径。”深圳微言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兼CEO黄聪认为,随着数据交易市场不断成熟和评估标准逐渐统一,这一模式有望成为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

“公共数据正在越来越多的场景中为金融业务发挥关键作用。”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数字金融部总经理史唯白说,通过引入浦东新区数据局的“时空数据”评分结果及其集成的三方数据,该行对商户经营情况的判断效率和准确度得到极大提高,双方共同设计的“烟火贷”也得以摆脱传统授信要“看报表”“看税票”的掣肘,商户贷款的可得性和审批额度均有所提升。

浙商银行科技管理部总经理董佳艺认为,作为金融“五篇文章”的数字底座,以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为关键驱动的数字金融,不仅能提升金融服务质效,还能更好赋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部分银行采用智能风控技术,将小微企业贷款审批时间从7天缩短至3分钟,有效加快了资金流转。”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刘勇说,大数据征信和AI信贷模型大幅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创新驱动 推动行业变革

“以前要跑很多次,才能办完理赔咨询、理赔报案、临柜办理、递交资料这4件事,如今通过企微专线一对一服务,客户可一次性体验咨询解答、理赔报案、资料上传等服务,大部分客户申请当天或次日即可到账到账。”中国人寿险重庆市分公司科技部总经理曾浩说。

曾浩介绍,重庆分公司与医保、医疗机构等单位合作,强化医疗健康大数据运用,让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客户入院便提醒其报案,客户出院后提供身份证件及领款账号就能便捷理赔。

“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金融机构能够简化流程,设计更加个性化、智能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让客户随时随地享受金融服务。”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国家

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建议,进一步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要素价值挖掘,给予金融机构政策支持。

加快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金融机构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选择。这一趋势从金融科技投入上可见一斑。上市公司年报显示,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金融科技资金投入逐年增加,2023年四大行金融科技投入总额接近1000亿元,较2019年增长超70%。

“目前,我行的手机银行已实现数十项智能化场景应用,通过自然语言交互等途径,让手机银行实现从‘货架式’‘搜索式’到‘多轮对话式’场景服务的转变。”工商银行网络金融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说,数字金融与场景化的结合,不仅提升了用户体验,还拓展了金融服务的边界,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中国银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要平衡好发展与安全、守正与创新的关系,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竞争力。

防控风险 完善金融生态

“随着金融风险的综合性和隐蔽性不断上升,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存在一定局限性。”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表示,从实践看,“金融监管+大数据技术”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新路径。

在宁波,为筑造数字风控坚实屏障,人民银行宁波市分行建设并优化了宁波市普惠金融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提供纳税变动幅度、不动产查封等28个关键指标,供金融机构设置差异化阈值实时监测。截至2024年末,累计推送预警信息44.8万条,涉及主体4.8万家。

在重庆,为探索适应数字经济多元化解机制,渝中区推出数字金融“一站式”解纷平台,通过设立数字金融纠纷“投诉中心”“调解中心”“仲裁中心”,提升数字金融服务能级,完善数字金融产业生态。

在苏州,得益于“金融企业风险计算器”的上线应用,苏州工业园区实现了大量潜在风险的早发现、早处置。2024年前三季度,当地提前发现并处置的类金融企业风险比上年全年增加了102%,助力政府高效精准监管。

“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大幅提升了风险监测效率,更为广大群众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苏州工业园区行政审批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江说。

与此同时,金融监管机构也在持续发力。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分局抓住总局搭建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契机,推出“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应用场景,赋能辖内金融机构更好解决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难题。

“通过平台的‘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应用场景,我们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企业外汇收支状况及衍生品交易情况,从而为其量身定制汇率避险产品,服务质效大幅提升。截至去年年末,我行已累计为20家企业办理729笔汇率避险业务,金额达10亿美元。”中信银行绍兴分行相关负责人说。

数字技术有效赋能防控和管理风险的同时,数据自身的安全问题也引起广泛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中泰证券总经理冯玉志提出,当前,数据治理水平不足、数据权属界定不清晰等问题普遍存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措施有待完善。建议充分平衡好数据的“保护”与“利用”,既要加强安全防范、隐私保护,做好分级管理,也要防止过度保护,避免形成数据孤岛。

全国人大代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朱建弟建议,通过数据挖潜、AI算法等技术,对金融机构或客户进行分类,识别出有风险的群体;运用预测算法对金融市场趋势和风险进行预测,提前发现潜在的、系统性风险迹象,从而为监管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经济信息社记者 刘玉龙 霍卓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